

爱国诗人柳亚子与南社

张鸿俊



柳亚子

柳亚子(1887-1958),原名慰高,又名人权、弃疾,字安如,一字亚庐,江苏吴县人,清末秀才,忠贞的爱国者、诗人和民主革命家。

柳亚子家学渊博,聪颖早慧,幼受母教,喜读古诗,3岁能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,12岁就背完《杜甫全集》,16岁的柳亚子,已读遍自家书房的藏书。

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、意气风发的诗篇,计有诗7000余首,词200首。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。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,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。辛亥革命后,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。五四运动后,他的创作转入

了新时期,一直歌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。

南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,它是清末民初所谓“革命文学”的重要阵地,在文坛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;此外,它以同盟会-国民党为依托,在反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因此,在当时的政坛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

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由柳亚子、陈去病、高旭等在苏州虎丘张园维祠发起成立,它以“洗前代结社之弊,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”为文化宗旨,与同盟会旗鼓相应,用文字激荡时代风潮,提倡民族气节,发扬爱国民主思想。命名为“南社”,意谓“操南音,不忘本也”,提倡民族气节,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。

成立之初,南社第一次虎丘雅集,到会17人,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。而到鼎盛时期,会员多达1100多人。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,提倡科学和民主精神,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,为推翻封建统治振臂高呼,被誉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先驱。南社是继清末复社虎丘大会后,近代人数最多、分布最广、领域最宽、影响最深的先进文人团体。南社为辛亥革命做出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,可谓辛亥革命的思想发源地”。

南社选择在苏州虎丘张园进行第一次雅集,是因为在南社创始人看来,虎丘似乎不单纯是风景名胜,更是一个富于斗争意识的政治标志和文化符号。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张公祠,因明末苏州巡抚张国维投水殉国的悲壮事迹,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风标。

辛亥革命中,大批南社成员积极参与其中。比如,陈去病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,深得信赖和赞誉;辛亥革命前夕,连续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的费公直,毅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,参与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;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庞树柏参与肇画上海光复计划,随后离职并赶回常熟策动响应;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旭,更是身携孙中山的图章,客观上成为孙中山在国内的联络人……

“辛亥革命的思想、意识根源在南社。”辛亥革命前后,南社成员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积极配合,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揭露清朝反动统治、宣扬民主革命的诗文,如陈去病发表《革命其可免乎》等文章,而《国粹学报》《复报》《江苏》等革命刊物的主编、主笔,则都是柳亚子、陈去病等南社成员。南社重视文化的社会作用,对辛亥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南社成立时,柳亚子年仅23岁,意气风发,勇于任事。他以梁山泊上的及时雨宋江喻陈去病,而以小旋风柴进自命,在会前会间,奔走筹划,不遗余力。柳亚子曾赋诗一首:“寂寞湖山歌舞尽,无端豪俊又重来。天边鸿雁联群至,篱角芙蓉晚艳开。莫笑过江典午鲫,岂无横槊建安才!登高能赋寻常事,要挽银河注酒杯。”

南社从成立到停止活动,历时15年。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,南社革命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。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组织者,柳亚子以苦干实干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柳亚子是南社社务的主持者、南社活动的中心人物,当时就有“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”的说法。《南社丛刊》是南社主办的刊物,22集,大部分的编辑、校印者是柳亚子。因此,他被公认为南社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坚持者。

柳亚子推崇袁自珍,“三百年来第一流,飞仙剑客古无俦。只恐孤灵灵箭意,北驾南叙到白头。”他追怀民族英雄,悼念革命烈士,揭露清朝的腐朽黑暗,抒发革命的怀抱和理想,表现出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意志,“翩翩亚子第一流,七律直与三唐侔”。柳亚子写了许多七言的律诗和绝句,既不像陈去病那样拘谨板滞,也不像高旭那样恣肆放纵,而是清新朴实、流转自如,这是受袁

自珍的影响。“中国的文学语言,无论雅言或常语,在柳亚子的笔下就像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,真是得心应手”。

辛亥革命失败后,柳亚子不像南社的许多诗人那样容易消沉颓丧。他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,“锐气慷慨奏平胡,大局终怜一着输”。在讨袁声中,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扬的,《孤愤》诗写道:“孤愤真防决地维,忍抬醒眼看群尸?美新已见扬雄颂,劝进还传阮籍词。岂有沐猴能作帝,居然腐鼠亦乘时。宵来忽作亡秦梦,北伐声中起誓师。”诗人愤怒斥责袁世凯的盗国,也鞭挞了刘师培等人。

1923年10月14日,“新南社”在上海成立。柳亚子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,也是他最早提出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。新南社与南社一样,集聚了当时的一批精英人物,除了柳亚子、陈去病、于右任、邵力子等旧南社人物,还新增了陈望道、沈雁冰、杨杏佛、廖仲恺、何香凝等革命先驱,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。

新南社作为革命文学团体,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宗旨、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,它继承了南社先贤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社会责任感,发扬了南社先贤锐意革新、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。

公共卫生学专家邓一颉

张贵付



邓一颉

邓一颉,又名子重,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郴州。

邓一颉幼时随父习字作文,后就读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郴州所办的新华学校小学部(现郴州市一完小),14岁毕业,随父助教于私立学校。两年后,以负责教室清洁和管理灯火为条件,免费入新华学校中学部读书,并参加基督教,成为信徒。

教会历来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。三年级时,邓一颉因组织学生游行,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,因此违犯教规,又拒绝悔过而被学校开除。后转入湘潭益智中学,1920年6月毕业。长老会认为邓一颉是个人才,旋即聘任他为新华学校教员。

1922年8月,邓一颉得到新华学校校长资助,考入长沙雅礼大学医学预科班,两年后升入湘雅医学院本科学习。

1926年秋,北伐战争爆发,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。时任湘雅医学院学生会总干事的邓一颉,积极参加驱逐军阀、打倒列强的学潮。学校因教员纷纷离校而停办,他与部分同学投笔从戎,参加北伐军,任第八军三师一团长。

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叛变,大革命失败,邓一颉于1928年1月愤然离湘返乡,操锄务农。同年8月入中央大学医学院(现上海医学院)继续学习,1931年毕业,受聘于美国基督教教会开办的湘潭惠景医院,恢复了教徒生活。

1933年1月,邓一颉与小学教师王昌亚结婚。前妻范德贤未生育,生毁失考,葬于长冲铺村后山。与后妻王昌亚生育四个儿子,两个女儿。

在医院里,他以勤奋的工作,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获得病人和同事的信任。

邓一颉出身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,看到农村人口众多,疾病丛生,而又缺医少药,农民大多不讲究卫生,流行性疾病问题严重。在医疗实践中,他深感公共卫生、防病防疫对民众健康之重要,立志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。

1935年7月,邓一颉离开医院,到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工作,任省公共卫生科长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曾亲赴日寇制造霍乱流行地区调查,在长沙主办了三所霍乱病医院,后担任卫生署医防总队大队长,兼任第一、第七防疫医院院长、省卫生处主任技正、省立传染病医院院长等职。邓一颉参加了南岳省立第一医院的创建,开办各种卫生人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,还主持了湖南医用药品器材制造厂的工作,以适应战时需要。

1943年7月,邓一颉接任湖南省卫生处处长

长,一直主持全省卫生行政、业务及地方防疫工作,常年在湖南各地奔走,没有时间陪伴妻儿。直到1945年8月,日本投降,省府机关由耒阳回迁长沙后,才与分别多年的妻儿团聚。

抗战胜利后,时局仍不稳定,国家百废待兴,然而国民党官僚热衷于升官发财,忽视医疗卫生事业。邓一颉愤恨已极,于1946年4月辞去省卫生处处长职务。当年9月,获美国洛氏基金社资助,赴美国麻省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进修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。次年9月学成回国,被湘雅医学院聘为公共卫生学教授兼学科主任。之后,又任湘雅医院副院长、院长。邓一颉还相继兼任长沙、郴县一些中小学校董,资助家乡创设私立小学,被推举为常德广德医院、郴县惠爱医院董事及湘潭惠景医院董事长。此外,他还以国际协会医药委员身份,参与由沪运长药品、器械的分配工作。

据邓一颉的侄子邓家礼介绍,叔父性格耿直,言词坦率,不喜欢做阿谀奉承的事情,痛恨专横跋扈的官僚。有同事说:“在邓处长手下做事,钱都是用药水煮过的,一点油水也没有。”但每遇到需要帮助的人,他却鼎力相助,因而广交了不少朋友。

因邓一颉身材矮小,妻子王昌亚身材却比较高,朋友戏称他为“邓矮公”,喜欢叫他“二儿子家姑(身高一米八)一比高低,笑而视之。”他“自评”曰:“立身直,坐磐石,行不远离,眼短见识。嫉恶如仇,不好阿谀。直方坦率,不附权势。心境褊狭,思维局促。廉洁奉公,事多过劳。无人容人肚量,少壮志雄图。素不爱阿堵,老来一副穷骨。生平不作昧心事,白发回首自满足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邓一颉继续留任湘雅医院院长。1950年7月,家乡郴县疟疾流行,他与陈国杰教授一起深入许家洞镇株木山一带进行流

行病调查,写出了万余字的《郴县疟疾初步调查报告》。根据这份报告,省卫生处于同年11月在许家洞建立郴县疟疾防治所。在郴县,他坚持了11年的灭疟试验,获得了大量数据,为郴州地区基本消除疟疾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。

1951年3月,他协助医学院创办了医士班。1952年,又增办三年制公共卫生专修班,为湖南省培养了第一批卫生防疫骨干。教学之余,他还协助政府开展卫生防疫、医院管理、地方病防治,以及国防工程的环境卫生、大脑炎防治等工作。比如,在滨湖地区进行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,撰写了《岳阳血吸虫病初步调查》等专题报告。

1951年,邓一颉加入了民革。1953年10月,湘雅医院更名为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,邓一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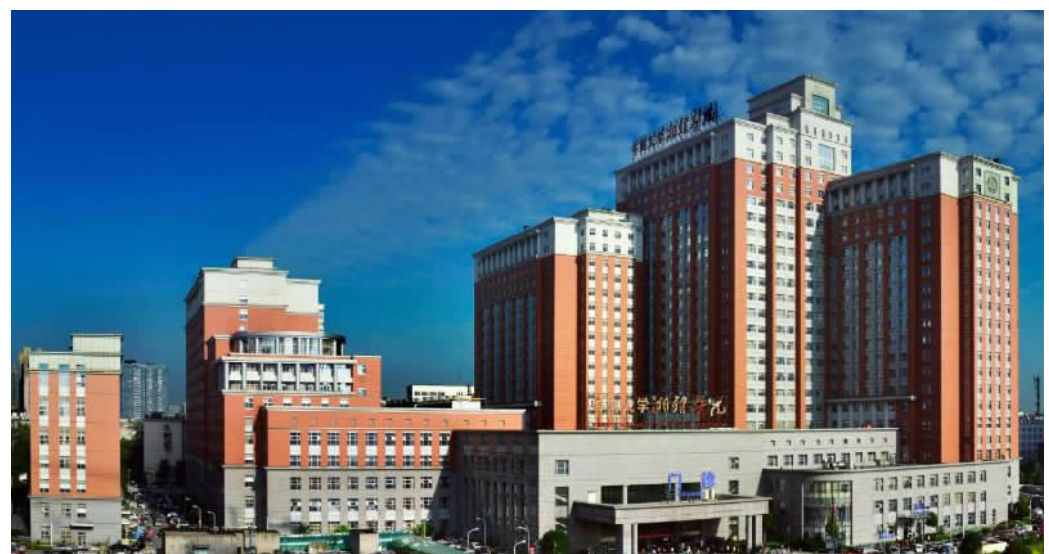
继续任附属医院院长,并担任了中华医学会理事。湘雅医学院更名为湖南医学院后,他任学院副教务长、医疗系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。在长期的卫生工作实践中,邓一颉撰写了《细菌战防疫概要》《霍乱在国内流行概况及流行病学的探讨》《学校卫生》等多篇著作。

1957年,邓一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,撤销院长等职务,由二级教授降为教研室资料员使用,他便从挖防空洞、刻印钢板等杂役中挤出时间查阅资料、翻译外著。

1979年8月,邓一颉恢复教授职称,继而被推举为湖南省政协常务委员,民革湖南省委委员。

1980年4月30日,邓一颉病逝于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,终年79岁。

如今的邓一颉故居,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(原郴县)南塔街道办事处东街左侧的“四李家声”。房子坐北朝南,长约25米,宽约15米,前面住家属砖木结构,后面住房为泥土结构。两栋房子占地面积均约150平方米,分上下两层,四方五间,连接两栋房子的中间有一口天井,便于采光,占地约75平方米,两栋房屋形成封闭式结构。



湘雅医院新貌

汪原放：古籍标点第一人

汪伟强



汪原放

民盟先贤汪原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用标点、分段形式出版古典小说的出版家,从1920年开始,先后出版了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《三国演义》等10多种新式传统小说。另外,还相继翻译了《一千零一夜》《我的旅伴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等近10部,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1897年,汪原放出生于安徽绩溪县华阳镇白石鼓的汪氏祖宅之中。汪原放出生没多久,父亲汪希颜就因病去世。1908年,好不容易读完小学的汪原放,因家境无力支撑其继续升学,无奈只好去芜湖投靠叔父汪孟邹,在芜湖科学图书社当一名学徒。

在当学徒的这段日子里,汪原放勤学上进,利用一切时间,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。在亚东图书馆工作期间,汪原放还专门跑到了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学习英文四年,这四年的英文学习也

为他日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汪原放与陈独秀的关系甚为密切。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创刊后,亚东图书馆成为刊物主要发行商。由于这层关系,陈独秀的二子陈延年和陈乔年,早些时候就住在亚东图书馆,并委托汪原放代为照顾。后来陈乔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,介绍汪原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,汪原放在武汉担任《民国日报》的编辑和经理,同时接替张大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局首任局长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,汪原放和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,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,返回上海重操旧业,继续书籍出版事业。

中国的古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当时这些小说一般是不分段和加标点符号,许多人没办法看懂,更谈不上理解小说表达的意思。1920年,汪原放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:出版标点、分段的白话古典小说。

这个决定可谓石破天惊,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出版过书籍,身边的亲戚、朋友都劝他不要这么干,连他的叔父汪孟邹也忧心忡忡的说:“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,妥当不妥?事情不是好玩的,标点、分段靠得住靠不住呢?”

就在这一片反对、嘲笑之中,汪原放开始了自己的标注之路。经过7个月的奋战,中国第一本标点、分段的白话古典小说《水浒传》终于宣告完成出版。新式标点出版的《水浒传》一经出版,便引起文化圈的轰动,这种新式标点的小说,一改之前旧小说不分段的老样子,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,大受读者欢迎。胡适说:“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《水浒传》重新点读

一遍,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,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。”陈独秀也在《〈水浒传〉新叙》中说:“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符号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,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。”就连当时的大文豪鲁迅也十分赞同汪原放的这种做法,认为新式标点符号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。

《水浒传》的成功给了汪原放很大的动力,他又相继分段标点出版了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等一大批古典名著,此时的汪原放在出版界可谓风声水起。上海的各大书商纷纷仿效亚东图书馆的做法,大量出版此类书籍,但他们中间许多人水平不过关,粗制滥造,更有甚者,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籍直接翻印,滥竽充数。对于汪原

放出版的新式书籍,文学艺术界大加赞赏,而汪原放却没有半点骄傲之语,说:“自己这几部分段标点的名著之所以能够打响,完全归功于书前胡适先生的考证和陈独秀的序言。”

20世纪60年代,有关领导找到汪原放,希望以他自己在亚东和大革命时期的经历,主写一本党的四十年出版史,他花费了六年的时间,最终完稿。但不幸的是,此时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书籍被付之一炬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汪原放搜集残余稿件,勉强完成了《亚东回忆录》,不过此书只有原稿的六分之一,甚为可惜。

试想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、白话小说、书籍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有了标点符号,我们才能如此自如的阅读书籍,这一切都离不开汪原放的功劳。

